

· 中拉关系 ·

华工问题与中墨建交始末^{*}

董经胜

内容提要 19 世纪中后期，墨西哥出口经济的增长和现代化的启动，带动了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与阿根廷、巴西等国不同，墨西哥的海外移民绝大部分不是来自欧洲，而主要是来自遥远的中国。正是出于引进华工的需要，墨西哥政府主动与中国清朝政府接触，导致了中墨两国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来自中国的华工为墨西哥的矿业、农业以及商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迪亚斯政权末期，墨西哥政府对于华工的政策开始转变，并在 1910 年后发生了多次排华运动。本文在参考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清政府的档案资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中拉关系 墨西哥 华工 迪亚斯

^{*} 19 世纪中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850～1875 年至 1914 年），拉美各国逐步摆脱了独立后政治混乱、经济停滞倒退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政治相对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新阶段，出口经济获得极大发展，工业化开始起步，社会和政治变革也接踵而至。这是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个“向现代性迈进的阶段”。在墨西哥，这一时期恰恰是波菲利奥·迪亚斯执掌大权的 35 年（1876～1911 年）。迪亚斯政权在“以一切代价保持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大力吸引外资，发展经济，迎来了“墨西哥的第一次现代化浪潮”。

经济的增长带动了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这是一个海外移民大量流入拉美的时期。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与阿根廷、巴西等国不同，墨西哥的海外移民绝大部分不是来自欧洲，而主要是来自遥远的中国。墨西哥政府在试图引进欧洲移民的努力失败后，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吸引华工。正是出于引进华工的需要，墨西哥政府主动与中国清朝政府接触，导致了中墨两国在历史上首次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两国的建交推动了中国人大量移居墨西哥。这些来自中国的移民为墨西哥的矿业、农业以及商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迪亚斯政权末期，墨西哥政府对于华工的政策开始转变，并

在 1910 年后发生了多次排华运动。这一转变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对于这样一个中拉早期关系历史中的重要问题，目前国内学术界尚未见专门的论述。国外学者做过一些研究，但他们依据的主要是西方的相关材料。本文在参考西方学者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清政府的档案资料，试图对这一问题做出一个较为明晰的分析。

殖民地时代跨越太平洋的大商船贸易不仅给墨西哥带来了丝绸等各种中国物品，也导致了中国最早向墨西哥的移民。16 世纪，在马尼拉大帆船的终点阿卡普尔科，有相当数量的亚洲人杂居在这个港口，其中也包括中国人。在墨西哥城也有中国人

^{*} 本研究曾受中流文教基金会与喜马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赞助。本文完成后，根据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林被甸教授和国际关系学院李安山教授的意见，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在此一并表示致谢。

Edward J. Williams and Freeman J. Wright,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Chapter 2. (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印，陈斌译：《拉丁美洲现代化史》。)

在此期间，除 1880～1884 年由迪亚斯的临时继承人曼努埃尔·冈萨雷斯执政外，其余时间一直由迪亚斯本人独掌大权。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 5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年，第 24 页。

曾昭耀：《墨西哥的三次现代化浪潮》，载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科学与现代化》，2004 年第 4 期，第 4 页。

李安山：《拉丁美洲华侨华人研究概述》，载《亚太研究论丛》，第 1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245～247 页。

收稿日期：2005 - 07 - 01

作者简介：董经胜，男，200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秘书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 100871）

居住，并出现了“唐人街”。这一贸易结束于1815年。但墨西哥获得独立后，许多墨西哥领导人寻求恢复与中国的贸易，作为刺激该国停滞的经济的一种手段，并试图促进中国向墨西哥的移民。例如，1865年1名葡萄牙商人从墨西哥政府得到特许建立一家公司，介绍亚洲移民到墨西哥。19世纪中叶中国人开始进入美国西部太平洋地区后，陆续有少数中国人从加利福尼亚南部越过美墨边界流入墨西哥，做工或经营小本商业。“1864年间，墨国中央铁路局由美商承办开筑，召华工南下，由美国之巴梳入墨国周省呵利市以南一带，此批华工为最先向墨国移植者。”但墨西哥政府有意识地吸引中国移民是在迪亚斯上台之后的事。

独立后的半个世纪中，墨西哥绝大多数政治精英对于国家的发展形成了一种共识，他们认为，墨西哥是一个潜在的富国，其潜力能够通过建立秩序和安全、交通体系的发展，以及成功地吸引移民而得到发挥。刚刚获得独立后的几届政府都做过几次努力以吸引移民，主要是吸引欧洲移民，但是收效甚微，这促使一些墨西哥领导人对于强调吸引欧洲移民的方案进行反思。发展部长比森特·丽塔·帕拉西奥在向墨西哥国会提交的1876~1877年的报告中指出，刺激欧洲移民的计划受到了政府缺乏资金和国家交通设施不完善的阻碍。更重要的是，欧洲人将不会接受墨西哥劳工的生活方式。而且，欧洲移民希望定居在人口中心，而这些地区恰恰不需要移民。合乎逻辑的结论自然是非欧洲移民可能更适合墨西哥的需要，这一结论首先由马蒂亚斯·罗梅罗公开宣传。罗梅罗写了一篇分析移民问题的长篇文章，于1875年8月20日发表在墨西哥城的《世界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罗梅罗注意到吸引欧洲移民的困难，并得出结论，即使欧洲移民来到墨西哥，也将被吸引到气候温和的高原地区。但是，他指出，“不能怀疑，我们最迫切需要移民的地区是沿海地区，不仅因为这些地区人口最少，而且这些地区生产的农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价格最高。”由于气候原因，欧洲人将不会在那里定居，印第安人也不会移居到那里。“在我看来，惟一能够在我们的沿海地区定居和工作的人是亚洲人，主要是中国人，他们来自与我们的气候类似的地区。那个庞大帝国的众多人口、他们中大多数是农民的事实、他们挣得的相对较低的工资，以及我们的沿海地区与亚洲的接近度，意味着对我们两岸而言，中国移民将是最容易和最方便的。”为了将其建议

付诸实施，罗梅罗提议向中国派出代表，“专门负责研究与移民有关的所有事宜”。1876年，罗梅罗又发表了一篇题为《向中国和日本派遣墨西哥外交使节的好处》的文章，除了重复上述观点外，还讨论了与中国和日本建立商业联系的问题。

在迪亚斯的第一任期内，没有做出与中国建立联系或者吸引中国移民的努力。然而，1880年后，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和他的精力充沛的发展部长卡洛斯·帕切科首次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系。1881年3月，发展部给外交部长伊格纳西奥·马里斯卡尔的信中说道：“随着通向太平洋的铁路修建的特许将被授予，本部相信与中华帝国和日本建立商业联系的时机已经到来。”马里斯卡尔回信说，外交部希望在这两个国家任命领事代办，但与此同时，“促进和刺激贸易”的最佳途径是发展部鼓励建立“一条或几条”通往亚洲港口的轮船线路。他建议政府资助这样的线路。1882年，马里斯卡尔还指示在华盛顿的罗梅罗与那里的中国和日本外交人员建立联系。同时，帕切科的发展部正在实施马里斯卡尔的建议，结果是成立了墨西哥太平洋航运公司。1884年3月，该公司与发展部签订合同，开通墨西哥与东方的定期航线。每一次航运结束后，公司确保得到一笔补贴；每引进一名亚洲劳工，将得到另外一笔补贴。从一开始，华工的引进成为公司赢利的关键。

墨西哥太平洋航运公司的成立导致了墨西哥、英国以及中国之间复杂的外交交涉。1884年下半年，该公司的一艘船试图从香港载运中国旅客赴墨西哥，但被阻止。公司求助于墨西哥外交部，马里斯卡尔代表公司进行调解。由于中国对于其公民前往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或者没有领事代理的国家

吴凤斌：《墨西哥早期的中国移民》，载《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第345页。另可参阅罗荣渠：《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历史联系》，载《美洲史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51页。

“19世纪初，拉丁美洲掀起民族独立运动。1813年，阿卡普尔科港毁于战火。1815年，最后一艘马尼拉大帆船从墨西哥返航，早期中拉贸易结束。”见洪育沂主编：《拉美国际关系史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年，第496页。

Iyo Imura Kunimoto, *Japan and Mexico 1888 - 1917*,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75, p. 23.

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见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8页。

Kennett Cott, “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 1876 - 1910”,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7 1, Feb. 1987, p. 64, p. 66, p. 67.

感到疑惧，墨西哥表示，在墨中两国建立正式的外交联系之前，允许英国外交人员代表中国，保护在墨西哥的中国人的利益。但是，中国拒绝了这一方案。

墨西哥太平洋航运公司不是惟一一家对引进华工感兴趣的企业。1885年，圣弗朗西斯科的温沃公司为了促进移民，建议罗梅罗与中国签订一项条约。1890年，两家在美国的中国公司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在这些公司和其他一些私人以及发展部，可能还有冈萨雷斯（以及1884年重新当上总统的迪亚斯）的压力下，外交部试图与中国建立联系。1884年3月，墨西哥在香港任命了商业代理。8月，外交部指示罗梅罗在华盛顿就签订一项商业条约的事项与中国驻美大使郑藻如接触。1885年11月，罗梅罗被授权参照巴西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与中国就签订通商条约问题进行谈判。郑藻如将此报告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指出，“‘墨西哥系无约之国，未与立约，将来保护（华工）无权’，‘与其于（华工）既受凌虐之后始行设官挽救，害大而事难，不若乘其未往之先，妥订章程，设法经理，事易而害小’，主张与墨西哥立约建交以利于处理华工问题。但总理衙门鉴于广大人民强烈反对洋人拐骗与虐待华工，而保护华工问题又不易交涉……因而这次仍指示使臣予以婉拒，此事遂寝。”但是，直到1889年，罗梅罗继续不断地进行努力，但是仍受到挫折。对此，1886年（光绪十二年），中国出使美、日、秘国大臣张荫桓给国内的信中有如下记述：“墨西哥公使罗墨（罗梅罗）往还未晤，遽来照会，请示期商定通商条约。荫桓复以未奉有廷谕，不敢遽与商定云云。……查墨国通商之意，志在招工。”张荫桓同意前述总理衙门的看法，认为：“惟该国土人，亦厌恶华人之甚，恐将来仍蹈美西故辙，不能不慎之于始。”

二

1891年，在华盛顿的清朝驻美公使伍廷芳与罗梅罗接触，就友好和通商问题进行磋商。谈判开始于1893年并持续到1894年。同时，1894年清政府新任驻美使臣杨儒奉命接受墨西哥政府邀请，派员赴墨西哥考察，具体了解当地实况。随后杨儒将考察情形呈报总理衙门，并指出居墨华侨对“通商一事，盼望綦殷”。1895年，墨西哥因故中断了谈判。1896年，伍廷芳与罗梅罗重开谈判，经过协商，互作让步，共同拟定了条约文本。次年，当准

备签署条约时，罗梅罗突然病故。1899年夏，墨西哥新任驻美公使阿斯皮罗斯又与伍廷芳再次会商，最后修订条约共20款，于同年12月14日正式签署《中墨通商条约》，在两国历史上首次建立了外交关系，这离墨西哥首次要求两国签订条约已整整过去了15年。清政府的立场之所以发生转变，是由于中国的对外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爆发了义和团运动。清政府为了维护统治，考虑向墨西哥“疏通华民去路”，以收“广开利源，隐消患黎”之效。总理衙门的奏折指出，“近年因美国禁工过严，不得不借以（指通过与墨西哥建交）疏通华民去路。且以该国居民即少，矿土尤多。……非徒为通商招工，并欲招致华民授田开垦，与从前古巴秘鲁等处招工情形迥不相同。前接杨儒奏称，华民赴墨，工值虽廉，而土客可以相安，商税虽重，而开垦之人可以迥免。且一经认垦，即为永业。……此约一定，于出洋华民生计不无裨益。”对于这段过程，伍廷芳在向清廷的奏折中做了如下说明：“光绪甲申、乙酉间，该国以立约招工来请，久无成议，经前任使臣杨儒派员赴墨察看情形，拟定约款，电总理衙门奏明筹办。旋以墨政府久无确音，复由墨约暂难定稿缘由，奏明在案。……臣接任后……驻美墨使阿斯比（皮）罗斯来美，复与议谈……现经厘为二十款。”

根据这项条约，墨西哥得到了最惠国待遇和治外法权。对于保护华工利益而言，最为重要的是条约的第五款、第六款和第十七款。

其实，早在1899年中墨立约订交之前，尽管受到中国政府的阻止，但中国向墨西哥的移民一直没有停止，且人数逐年增加，到1895年大约有

沙丁、杨典求：《清季我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的首次建交及其影响》，载《拉丁美洲史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342页。

《出使美、日、秘国大臣张荫桓咨呈总署告以墨西哥欲订约而意在招工函》，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9页。

《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墨西哥约款已妥订情形折》，转引自沙丁、杨典求：《清季我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的首次建交及其影响》，载《拉丁美洲史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第343页。

《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墨西哥约款已妥订情形折》，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41页。

《中墨通商条约》、《出使美、日、秘国大臣伍廷芳奏墨西哥约款已妥订情形折》，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41~1242页。

1 000名中国人居住在墨西哥。两国签订商约后，前往墨西哥的移民有了进一步的增长。1902年后，由伍学晃、黄兴国等开设茂利及中华轮船公司，先后正式运载华人到墨西哥。除此之外，葡萄牙、法国、英国的招工者也大量参与了将华工运至墨西哥的活动。“斯时墨西哥口岸未有移民局之设，外人入境，并无限制。”由1902年3月至1921年商约期满，计入墨之华侨不下三四万人。虽然1899年的中墨条约中加进了防弊条款，但是中国人出洋去墨西哥的时候，仍然不免被外国招商商人的金钱诱惑和虚假诺言所骗。去墨西哥的中国人有很多不是自出旅费，而是由别人资助的。隐蔽的、但是组织很严密的赊单办法暗中存在。1906年间中国的三都澳、福州和上海三处通商口岸，差不多同时都查获法国和英国商人为墨西哥的罗莎利亚·宝琉铜矿诱骗中国人出洋做工的案件。抵墨中国人一般在墨西哥的太平洋沿岸港口登陆，然后被引导到劳动地点。华工一般受雇于修建铁路和热带地区的农业中，以及墨西哥北部的矿山中，工作契约规定的时间通常为两年，工资很少超过每天1比索。

在墨西哥的契约华工的景况常常是惊人的糟糕。1891年，埃伊·劳伊公司的代理人向修建特乌安特佩克铁路提供劳工，他向迪亚斯抱怨，他的1 000名工人被分散在地峡两岸，很多人居住在难以进入的工棚中，自从他们到来后就从未领到过工资，他们还在挨饿。1899年，差不多500名华工受雇于墨西哥中央铁路的圣路易斯波托西-坦皮科支线，他们向驻美国的中国外交官寻求救助。这些华工反映，他们是被昂倭公司征募来的，开始以为将受雇于英属哥伦比亚的维多利亚。但是到那里后，他们被关在铁路机车内并被转运到蒙特雷，然后又到坦皮科。他们每月只有26比索的工资，其中5.25比索被扣除以偿还昂倭公司，12比索支付饭费，8比索支付“衣服、靴子和鞋子”。他们抱怨，“不论晴雨，我们都要辛苦劳作，要忍受各种各样的困苦，不敢睁一下眼睛”，一些华工被殴致死。

华工境遇最差的地方是在尤卡坦，他们或者被私人公司雇佣来修建铁路，或者受雇于龙舌兰种植园。那里的条件如此之差，以至于在1905年墨西哥城的中国领事到该半岛调查华工受虐待的情况。1910年，墨西哥罗莎利亚·宝琉铜矿公司发生虐待、迫害在铜矿内做工的华工案件。受害华工分别向中国外务部和中国驻墨西哥及美国使馆提出呼吁，中国与墨西哥为此进行了长期交涉。

三

在迪亚斯时期，华工对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进入20世纪后，墨西哥开始重新考虑其对中国移民的政策。对华工的虐待招致了国际舆论的批评和外交上的交涉，这自然使墨西哥政府感到难堪。而且，中国移民也对墨西哥的法律和秩序带来了一定的问题。例如，虽然中国移民的犯罪率低于墨西哥的平均犯罪率，但是墨西哥外交部经常得到中国移民进行赌博和开鸦片馆等犯罪活动的报告。对此，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至外务部的信函中也有提及：“今墨国华侨已有数万，种种恶习，势所必有。”他说，“其最著者，如开设烟馆，华洋男女群聚吸食一也。开设赌场，日夕喧嚣，显干巡警禁例二也。私立堂号，每因小嫌，辄行械斗三也。卫生不讲，疾病丛生，衣服饮食，安于秽恶四也。不检细行，败俗伤风五也。”

但是，促使墨西哥政府对于中国移民政策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墨西哥国内对于中国移民的敌意日益增强。最初，到墨西哥的中国移民绝大多数是劳工。然而，许多劳工积累了少量资本后，转而从事其他职业，如流动出售水果和蔬菜，或者开洗衣店、旅馆、餐馆、商店等。1904年（光绪三十年）驻美国公使梁诚在给外务部的信函中提到，“举沃克丹埠之华侨生业言之，共有商店七八间，皆运中日杂货，销于华人最巨之店。……洗衣间约十间，餐馆约十间……”同年中国驻墨西哥参赞兼总领事梁洵也写到：“米利达，系于加敦省会，地在墨都东南……华侨人数，由二千五百以达三千。大商店七家，其三牟外利，其四牟华旅，其销

陈匡民：《美洲华侨通鉴》，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9页。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7~288页。

Kennett Cott, "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 1876 - 1910",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7 1, Feb. 1987, p. 71.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89页。

《使美梁诚为墨西哥弛禁华人登岸事致外务部函》，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43页。

《使美梁诚为祥陈华工在墨情况事致外务部函》，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45页。

路则茶丝磁绣俱有，而尤以爆竹为首屈。”在索诺拉和下加利福尼亚，他们很快控制了制鞋和制衣业。例如，到1903年，索诺拉州37家鞋厂中，华侨至少拥有10家，每年生产10万美元商品。到1910年，他们控制了墨西哥北部许多地区的小额贸易。据报道，他们在墨西哥城拥有资本达100万比索的钱庄，并在纽约和香港开有分号。中国移民取得最大成功的地方是在托雷翁，他们拥有一家主要的银行和该市的一条电车线路。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移民虽然在工商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仍不能与其他外国集团和墨西哥土著人相比。例如，1897年索思沃斯主持索诺拉州商业考察，在按地区统计的所有公司中，只有一家华侨公司，即隋福崇制鞋厂。德国、美国、法国和墨西哥商行都是作为主要的零售商和批发商占据显著地位，而北美人大都经营矿业。索思沃斯认为，低水平的不值一提的沿街叫卖的小商业、杂货、缝纫、洗衣、厨师等正是贫穷的华人所擅长的。但是，正是由于中国移民不像欧美人那样投资于墨西哥人无力经营的资本密集型企业，而主要是从事一些墨西哥人自信能够做到的中等程度的经济活动，这使得墨西哥人难以接受。因此，随着中国移民从劳工转向商业和服务业，并在这些领域与墨西哥人开始出现竞争，对于中国移民进行种族主义的攻击愈演愈烈。中国移民时常被丑化为罪犯、懒汉和本性残忍、吸鸦片者、赌徒以及可怕的沙眼、脚气病患者等。这种情绪很快导致了暴力事件。1886年在马萨特兰发生了一起针对中国移民的暴乱，在墨西哥城发生了几起无缘无故地袭击中国移民的事件。1891年，在诺加莱斯，因一家木材工厂雇佣中国移民而激起了罢工。1894年，在蒙特雷发生了针对中国移民的暴力事件。到1900年，此类事件已屡见不鲜，一些企业因此避免雇佣中国移民。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墨西哥政府加强了对入境中国移民的健康检查，目的在于限制中国移民的进入。1902年，在墨西哥城设立了最高健康委员会，并在韦拉克鲁斯和太平洋沿岸主要港口设立了机构对入境的人和物品进行检查、观察和隔离。1903年后，墨西哥内政部制定防疫章程，规定“嗣后华民来墨，应即遵照下开各款办理”。

1907年，内政部敦促最高健康委员会对中国移民的健康要求进行强制性的管理。到1908年，确立了管理移民的固定程序。当时，中国移民大都

通过萨利纳·克鲁兹入境墨西哥，在这里，专门健康检查员对于前来的船只进行检查，只有具有健康证明并看上去身体健康的人方可下船。被允许上岸的人要被关在属于轮船公司的房子里，隔离10天，对他们以及他们的物品进行消毒。任何表现出生病迹象的人都要被送回船上。政府官员、船主、移民和外交人员之间的冲突时常发生。

为了对华人入境问题提出一项政策建议，1903年，墨西哥内政部任命了一个以格纳罗·拉伊格萨为首的委员会，研究中国移民和日本移民的问题。但是，直到迪亚斯倒台前，该委员会也没有提交一份正式的报告，政府除了加紧健康检查外也没有什么新的举措。大量的中国移民继续进入墨西哥，反华情绪继续增长，特别是在北部各州。政府意识到墨西哥存在着一个“华人问题”，但是政府内部的利益冲突以及政府的惰性使它最终没能提出一项解决方案。最终，随着1910~1917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发生了严重的暴力性的排华行动。

(责任编辑 鲁渝)

主要参考文献

1.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5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
2. 曾昭耀：《墨西哥的三次现代化浪潮》，载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编《科学与现代化》。
3. 吴凤斌：《墨西哥早期的中国移民》，载《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
4. Iyo Imura Kunimoto, *Japan and Mexico, 1888 - 1917*,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1975.
5.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1985年。
6. Kennett Cott, "Mexico Diplomacy and the Chinese Issue 1876 - 1910", *Hispanic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67 1, Feb. 1987.
7. 沙丁、杨典求：《清季我国和一些拉美国家的首次建交及其影响》，载《拉丁美洲史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年。

《照抄驻墨参赞兼总领事官梁洵来禀》，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47页。

[美]胡其瑜：《移民与发展中的社会——墨西哥北部的华人》，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44页。

When the Fifth Republic Movement (MVR) in power, Chavez amended the constitution and increased the power of the citizen.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for 2001 – 07, social equality was emphasized, and the low income class in particular was given many sorts of assistance in economic and social areas. In addition, MVR carried out educational and health-care reforms and used oil incomes to generate employment and fight against poverty. (Lin Hu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pp. 22 – 31)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s early as in the colonial period, great amount of resources was exploited and the environment was starting to deteriorate. In the modern times, with the rapid movement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drive, the environmental issue has become all the more conspicuous.

By the mid-1980s, the high growth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came to an end, but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 was far from being resolved. This was mainly due to the following two reasons: On the one hand, globalization made it possible to exploit more resources; on the other, Latin American governments did not design an effective mechanism to manage the ways of tapping resources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n the future, in order to reach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Latin America needs to use environment-friendly technology to open up resources, including the use of land, promote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reate an institution that can benefit ecological protection. (Zhao Lihong)

Foreign Banks in Mexico (pp. 32 – 34)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1994, many foreign banks entered the Mexican market. The major reason behind this new development was due to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 Mexico has a large market, great potentials of economic growth, several competitive sectors and the advantage of geographical location. Second, in order to gain the confidence of the investor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the government of Mexico offered many incentives to the foreign banks. Finally, Mexico has the largest banking sector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re were many opportunities of making profits there.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banks has exhibited positive results. For instance, it has benefited the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efficiency and profitability of the banking sector have been on the rise, and the financial syste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termediate instrument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for the whole economy. Finally, foreign bank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und mechanism for risk assessment, efficient management and prudent supervision. However, foreign banks in Mexico tend to increase monopoly, raise service charges and cut employment. (Hua Lin)

Chinese Worker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exico in History (pp. 60 – 64)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export economy in Mexico created great demand for labor. Unlike Argentina, Brazil and some othe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which relied on Europe for the importation of labor force, Mexico attracted many workers from China. Therefore, Mexico took an ac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establishment of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 of China.

Chinese worker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Mexican economy. Entering the 20th century, however, Mexico started to adjust its policies towards the Chinese immigrants. When the Mexican revolution broke out, Chinese workers were discriminated, and violent expulsion took place in many places. (Dong Jingsheng)